

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 《三国演义》最早刻本续考

——就教于徐朔方先生

张志和

(国家行政学院 科研部, 北京 100089)

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的原作和最早刻本, 而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 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该本并没有题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为作者, 因此, 《三国演义》是由说书艺人和下层文人共同创作而成, 成书时间在明中叶, 其作者不是罗贯中。

关键词: 《三国演义》; 黄正甫刊本; 嘉靖壬午本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01)01-0051-03

最近拜读到徐朔方先生的《论〈三国演义〉的成书》一文^{[1](P)}, 收获不小。但该文之第三、四两节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问题作考证, 得出的结论是:“嘉靖本早于其他各本, 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另, 徐先生在该文的《附记》中, 用了不小的篇幅对拙文《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兼说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罗贯中原作》^[2]提出否定的意见。笔者非常感谢徐先生对拙文的重视, 但拙见以为, 像《三国演义》的版本、成书与作者这样复杂的问题, 实非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能够作出结论的。笔者曾为此下过一番考校工夫, 对《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版本源流与作者问题进行考证, 写了十多篇小文, 其中的一部分已在各学术刊物上陆续刊出。在这个过程中, 笔者阅读了大量前人乃至今人的有关论著, 但越是深入思考越感觉到, 旧说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该书最早刻本, 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这一说法靠不住。既然徐先生针对拙文又将这个话题引了出来, 笔者不妨再略述拙见, 以就教于徐先生及学界方家。

物的论、赞、评, 而无周静轩诗及关索故事者为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以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 包括满译本、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郑以楨刊本、素白堂刊本、英雄谱本、李卓吾评本、宝翰楼刊本、钟伯敬评本、遗香堂刊本、李笠翁评本以及毛宗岗评本等, 此类版本可统称为“演义本”系统; 另一版本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人物的论、赞、评, 而有数十首周静轩诗和关索故事, 属于这一系统的有黄正甫刊本、朱鼎臣刊本、叶逢春刊本、双峰堂刊本、种德堂刊本、杨闽斋刊本、汤宾尹校正本、诚德堂刊本、乔山堂刊本、忠正堂刊本、黎光堂刊本、二酉堂刊本、杨美生刊本等。这类刊本因多署名为《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或简称为《全像三国志传》, 姑且可统称为“志传本”系统, 但以情理度之, 《三国演义》最初只能有一个写定本。这些版本虽可分为这样两个系统, 从源流上看, 也只是流的不同。由于从表面上看,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现存各本中刊刻时间最早的, 它因此被一些专家在未经深入考证的情况下定为罗贯中的原作, 并将其视为最早刻本。现在看来, “志传本”系统之各本所依据的祖本要比嘉靖壬午本出现得更早, 黄正甫刊本就有可能是“志传本”系统的祖本或者接近于该系统最早刊本的一个版本, 甚至可以说它是今见《三国演义》各种版本中最早的刻本。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只能是在黄正甫刊本或者接近黄正甫刊本的某一版本的基础上, 又

收稿日期: 2000-10-01

作者简介: 张志和(1958-), 男, 河南邓州人, 文学博士,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研究员。

经过一番整理加工后刊刻的版本。笔者在《黄正甫刊本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兼说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罗贯中原作》一文中已对黄正甫刊本的情况作了介绍，并出具了一些证据证明它早于嘉靖本而存在，此不赘述。

应当说，那些证据证明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是很客观而确凿的。但徐朔方先生却对拙文提出了两点质疑，其一是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作的《序》，说该书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终于晋太康元年（280）”，依照这个说法，该书叙事首尾只有97年。而实际上，该书叙事起自汉灵帝建宁元年（168），终于晋太康元年（280），首尾总计113年，因此，笔者指出，蒋序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不足凭信。但徐先生认为：“如果不是刻板地考虑问题的话，始于汉灵帝戊申岁即建宁元年（168）同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也可以并不矛盾。前一说以小说第一节《祭天地桃园结义》开头‘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时年12岁’为依据，后一说则从同一节所纪中平元年黄巾起义作为小说纪事的开端，两者虽然相差16年，期间叙事不到1000字。”徐先生指说笔者“以此贬低蒋大器序，或进而贬低《三国志通俗演义》，根据不足”。

对此，需要申述的是，笔者无意贬低蒋序，更无意进而贬低《三国志通俗演义》。只是想说明无论是《三国志传》系统的本子，还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本身，开头的确都是从汉灵帝即位的建宁元年写起。从建宁元年到中平元年共16年时间，这部分内容，先讲当时发生的种种天灾，再叙杨赐、蔡邕上奏及蔡邕被贬、十常侍执掌朝纲。这1000多字恰恰是下文叙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的原因所在，怎么可以忽略不计呢？况且，黄正甫刊本、汤宾尹校正本、联辉堂刊本、朱鼎臣刊本等书中，都在卷首标明该书纪事起自汉灵帝戊申岁，止于晋世宗庚子岁（168—280），首尾总计113年。而蒋大器作序，却说该书叙事起自汉灵帝中平元年，这是明显说错了，同时，他把罗贯中的籍贯“太原”^{[3]（P281）}说成“东原”，也说错了。这两大错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以蒋大器的《序》为根据，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定为罗贯中，把嘉靖壬午本定为最早刻本，恐怕值得斟酌，起码是有疑点在。况且，拙文中另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确不是该书的最早刻本，而黄正甫刊本足以证明该书同罗贯中没有什么关系。

其二，拙文中曾谈到“周静轩的诗，在黄正甫刊本中共引用63首，到了后来的嘉靖本中，周静轩之名即被全部剔除，他的诗的确是被刊落了，但并不是

全部，尚有八首被保留下来，这八首诗全部被作为佚名诗而代之以‘史官有诗曰’或‘诗曰’字样”。徐先生认为：“联辉堂郑本、汤宾尹校正本也引用了周静轩诗，但这八首诗都没有标明它们的作者是周静轩，其中也有整首诗被删去的，当然不会有署名。张文断定这八首诗被嘉靖本沿用，而删去作者周静轩的姓名，为什么不是相反？”这需要详细考查。徐先生目验过联辉堂郑本，在此不必多说，笔者就国家图书馆所藏黄正甫刊本、汤宾尹校正本和嘉靖壬午本中周静轩诗的使用情况作了详尽的统计和对勘，统计的结果是：黄正甫刊本中有周静轩诗63首，汤宾尹校正本中有周静轩诗43首。黄正甫刊本中有5首标明为周静轩所作的诗，汤本删去了周静轩之名。这五首分别是，《杨奉董承双救驾》中的“血流芒砀白蛇亡”诗，汤本改为“后贤有诗为证”；《云长延津诛文丑》中的“誓把功勋建”诗，汤本改为“后人诗赞曰”；《关云长封金挂印》中的“月缺不改光”诗，汤本改为“后人诗曰”；《庞统智进连环计》中的“赤壁鏖兵用火攻”绝句，汤本改为“有诗为证”，并在第一句后插入“运筹决策尽皆同。阚生纳款期曹操，黄盖停舟待祝融。千里舳舻沉水底”四句，且将周静轩原诗之第二句“一江波浪起烟中”改为“一江烟浪起波中”，移于上述四句之下，合为一律；《关云长大战徐晃》中的“陆逊青年未有名”诗，汤本改为“诗曰”。黄正甫刊本中另有若干首周静轩诗，汤本中均无。

从嘉靖壬午本看，保留周静轩诗共八首，皆删去周静轩之名。其中有五首见于汤本，亦删去其姓名。另二首为汤本中所无，即《玉泉山关公显圣》中的“当年父子镇荆襄”诗和《司马昭南阙弑曹髦》中的“司马当年命贾充”诗。另外，黄正甫刊本《刘玄德古城聚义》一节中有“静轩诗曰”：

当初手足似瓜分，信断音稀杳不闻。

今日古城重聚处，正如龙虎会风云。

又诗道玄德遇子龙云：

玄德关张离散后，古城天赐再相逢。

从来良将扶明主，惟有常山赵子龙。

这两首诗在嘉靖本中也删去了周静轩之名，而改为“有诗曰”。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汤本中仅保留了前一首，而嘉靖本中却将二诗合并为一诗，这就暴露出嘉靖本袭用黄正甫刊本中的周静轩诗而删去周静轩之名的马脚来了。从黄正甫刊本中该处所引周静轩的两首绝句来看，前一首写刘、关、张离散后又重逢，后一首歌颂赵云择主而事追随刘备。两诗立意不同，各自独立成篇。嘉靖本中将其合为一诗，遂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诗的第五、六两句的意

思同前四句重复；二是前四句的韵脚与后四句不一致；三是平仄对仗方面不合律诗要求。在黄正甫刊本中，这两首诗摆在这个位置合情合理，到了嘉靖本中，两首合为一诗，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两相对照，显然只能是黄正甫刊本在前，嘉靖本袭用了其中的八首周静轩诗，却删去周静轩之名，而决不会是相反。

二

徐先生还谈到关索故事，认为嘉靖本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其中并没有关索故事，联辉堂郑本中的关索故事是后来的刊本“硬插进去”的，而事实是：在现存的 30 多个《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中，除了嘉靖本和个别直接出于嘉靖本的刊本（如满译本）之外，其他大多数刊本中都是有关索故事的，且某些刊本中的关索故事也互有差异，如黄正甫刊本与联辉堂郑本中的关索故事就有所不同，周曰校刊本中的关索故事又与上述两者都有出入。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用关索故事在《三国演义》中的存在情况来判断其版本所出之早晚。本文的目的是要证明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的出现，而该本中是有关索故事的，嘉靖本晚于黄正甫刊本，那么，无论其是否直接依据黄正甫刊本，嘉靖本中没有关索故事，都只能是它在修订旧本时将关索故事删去了。这决不是假说，除了上面所出的证据外，我们还有以下证据，可以确证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而存在。

拿两书的文字作比勘，亦可看出孰先孰后来。如果按照徐先生的说法，“嘉靖本早于其他各本，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那么，黄正甫刊本自然也是出于嘉靖本了。倘如此，黄正甫刊本在嘉靖本的基础上不论作多少删节和改动，它的文字内容也应当同嘉靖本基本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它应当大体上把嘉靖本中那些完整的和公认的好的文字和内容保留下来，总不至于会把正确的改成错误的、合理的改成不合理的、通顺的改成不通顺的吧。然而，对勘二书，所看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举例来说，嘉靖本《曹孟德横槊赋诗》一节中，写曹操吟咏《短歌行》一诗和《孔明初上出师表》一节中引用孔明的《出师表》全文，均完整无误。而黄正甫刊本中也有相同的内容，却错字漏句，比比皆是。黄正甫刊本中的《短歌行》诗如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既当以此，忧虑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皎如明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随。契阔

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无枝可栖。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恩威果怀，天下归心。

这样的舛错能是承袭嘉靖本而来的吗？显然不是，它只能是黄正甫刊本的写定者最初写到此处时，知道这首诗，但记忆模糊，手头又无现成的资料，凭记忆将其写下来，才造成这样的错误。黄正甫刊本中的《出师表》也有许多错字和漏句现象。这些都显示了黄正甫刊本草创初成的痕迹，决不可能是它晚于嘉靖本出现，抄录嘉靖本却抄得如此糟糕。

我们说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出现，并且保留着草创初成的痕迹，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就是它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点“许都”误为“长安”。该本第 13 卷《关云长刮骨疗毒》一节云：“却说关公斩了庞德，威声大震，华夏皆惊，连路不绝报到长安。曹操大惊。”同卷《吕蒙智取荆州》一节云：“孙权曰：‘可急发使往长安见曹操，催趲进兵，休得泄露。’权即发使往长安去讫。”在嘉靖本中相应的叙述中，这几处都把“长安”改为符合史书记载的“许都”了。很显然，黄正甫刊本说曹操在“长安”，是懂历史造成的错误，而嘉靖本是正确的。如果黄正甫刊本承袭嘉靖本而来，无论它怎样删改，也不至于将这样重要的地名抄错。那么，这个严重的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宋元以来讲说三国故事的艺人，因为不懂历史，都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点“许都”误为“长安”，这从《三国志平话》中可以得到证实：《三国志平话》中写到曹操与袁绍交战（即嘉靖本中写的“官渡之战”），颜良打败了夏侯惇和曹仁，“曹操引败军回长安”；关羽辞曹，也是“请二嫂上车，出长安，西北进发”；以下的讲述中，都是写曹操在“长安”。水淹七军后，也是“于禁回长安说于曹操”，甚至说曹丕称帝，也是在“长安西南五十里有一村，名凤凰村，此处筑一台，名受禅台”。这些显然都是不懂历史造成的错误。而黄正甫刊本在最初写定时，主要是记录书场上的三国故事，再参以《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作“按鉴考订”，虽然对书场上的三国故事中的许多地理错误作了订正，但却因为疏忽，没有将这几处地理错误纠正过来。在这些地方，都保留了它因袭早期的像《三国志平话》类的说书故事的痕迹。这一点也足以说明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出现，而嘉靖本不可能是什么罗贯中的原作和最早刻本。

在《三国演义》的研究中，版本源流的考证是个关键。如果我们认为嘉靖本是最早刻本，那么该本上有“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该本序言中又有“东原罗贯中”创作本书的说法，（下转第 64 页）

是可能的。迪基的习俗论、古德曼的审美征候说以及布洛克的审美距离说等等,都是如此。分析美学的这种新发展态势使分析美学再次受到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也再次说明,形而上学的本性是人固有的不可舍弃的精神家园,但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分析美学沿着这一态势发展,它还是分析美学吗?不管怎样,我们可以适当地利用语言分析的某些专门方法来研究艺术问题并积极地关注分析美学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路·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 摩尔(G. E. Moore). 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M]. 伦敦: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9.
- [3] 涂纪亮. 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4] 语言. 艾耶尔·真理与逻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 [5] 路·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6] 瓦·阿·古辛娜. 分析美学评析[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0.
- [7] 肯尼克. 传统美学是否基于一个错误[A]. 李普曼. 当代美学[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 [8] 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 艺术及其对象(Art and Its Object)[M]. 英文版. 伦敦: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0.
- [9] R. 舒斯特曼. 分析美学的回顾和展望[J]. 哲学译丛, 1990, (4).
- [10] 莱斯泽克·柯拉柯夫斯基. 形而上学的恐怖[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11] 卡尔纳普. 哲学与逻辑语法[A]. 怀特. 分析的时代[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2] 德里达. 写作与差异[A].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语言的牢笼[C]. 北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刘剑涛]

On Analytic Aesthetics' Predicament and Its Developing Trend

SHI Feng hua

(Chinese Literature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Analytic aesthetics stems from analytic philosophy directly. 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hools of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t seeks to abandon the essence of beauty and engage in words analysis. In its early stage, analytic aesthetics refuses metaphysics and lands in a predicament gradually. It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entirety in later period and is named post-Analytic Aesthetics.

Key words: analytic aesthetics; predicament; developing trend

(上接第53页)

无疑就把本书的作者同元末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所记载的“罗贯中”连在了一起。这部书也就成了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著作。如果我们确认了黄正甫刊本乃今所见的最早刊本,根据本书的情况来了解其成书与作者的话,那么,这部书从头至尾只有刊刻者的名字,而没有标作者为何许人,而该书出现在明中叶,足以说明它是从北宋到明中叶的说书艺人和戏曲艺人们长期演说,使故事逐渐得到丰富和完善,最后在明中叶被某个不知名的下层文人将其记录下来并参考史籍整理成书的。后来的数十种翻刻本又都不断地对其作加工,才形成了这部古典名著。而嘉靖本只是这些翻刻本中的一种,并且是对原本做加工整理较多的一种而已,它标为“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是为了抬高声价,这对后人认识该书的形成制造了一个极大的误会,甚至对我们认识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产生与发展都造成了极大的错觉。现在,我们终于发现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存在,它为我们重新认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这难道不是一件幸事?恳请徐朔方先生和学界方家多赐教诲,以便把这一问题的探讨继续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 徐朔方. 小说考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2] 张志和. 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兼说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罗贯中原作[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 (2).
- [3] 明·无名氏. 录鬼簿续编[A].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2册[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2.

[责任编辑 刘剑涛]